



## 北京图书馆藏西夏文佛经整理记

史金波 黄润华

西夏文文献在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文献宝库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所有西夏文文献中,又以佛教经典为最多。北京图书馆所藏大批西夏文佛经无论是数量上还是种类上,在国内都首屈一指,差不多占国内所藏西夏文佛经的90%。这批佛经为研究西夏佛教乃至历史文化,语言文字,提供了丰富的、有价值的资料,因而早就引起国内外有关专家的重视。1937年周叔迦先生曾在《辅仁学志》2卷2期上发表《北平图书馆藏西夏佛经小记》,对当时馆藏西夏文佛经作了概括的介绍,同年又刊布了这批佛经的目录,以《馆藏西夏文经典目录》为题发表在《北平图书馆馆刊》四卷三号《西夏文专号》上(以下简称周目)。这个目录第一次向国内外学术界介绍了北图所藏西夏文佛经的概况,使学术界对这些佛经的数量、种类、版本特点,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为西夏研究专家们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材料。然而,在几十年后的今天看来,对这批重要的文献还有重新整理的必要。首先,北图入藏情况发生了不小变化,后来增加的二十余部西夏文手写本《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就是这种变化的典型,它们当然为周目所未收。第二,周目仅译出当时所存佛经的卷名和部分品名、题款,大部分品名和最为重要的长篇发愿文、序跋均未译出。周目题款中误抄、误译和缺译者不少,当时虽经罗福成补译一遍,<sup>①</sup>仍未能臻于完备。佛经中的发愿文和序跋,涉及问题较广,对西夏佛教的研究举足轻重,尤有整理、译释的必要。第三,这些经典中,有

部分是完本，有不少是残本。其中页面散乱，次序颠倒者有之；一经分入两册，一册杂含数经、互相混杂者有之。若不清理、归纳，使之卷册分明，便无从利用。第四，周目对原藏佛经的版本形制、大小、页数多少，都做了详尽的记录，但对佛经译、校、刻、写的时代未做专门的考证。这在当时条件下，原无可厚非。现在由于研究工作进展的需要和可能，理应尽量考证明白。第五，馆内后来入藏的一部分西夏文佛经中，有的显系伪造复制，一些专家未辨真伪，视为真本。现在找出真本之特点，伪造之迹象，以免鱼目混珠，看来也是十分必要的。第六，这批佛经大都为宋、元旧版，皆以善本入藏，由北图妥为保管。但其残本破页因未能整理而不能裱糊粘连，时间越久，腐蚀益重。从珍贵图书保护方面看，也亟待重新整理。总之，整理这批珍贵的佛经，不但是必要的，且可说是当务之急。

1973年我们就着手对北京图书馆所藏这部分西夏文佛经进行整理<sup>①</sup>。后因“四人帮”的干扰而中辍。1981年我们又把这一工作列入工作计划，1982年先后集中利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初步完成了整理工作。我们认为首先应把新整理的馆藏西夏文佛经目录发表出来，其中不仅包括经名、品名、简短题款的翻译，还包括译、校、刻印时代的注释等，以供研究者参考。至于长篇发愿文和序跋的译文和考证，因限于体例和篇幅，只能陆续与读者见面。如果这个目录对研究西夏文的国内外专家和关心西夏文献资料的同好有所补益，就算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下面仅就几个问题略谈一谈这次整理工作的过程、收获和体会。

### 一、整理经卷

馆藏西夏文佛经分为八包，共一百一十三卷，另有残页二纸、经卷一轴，分属一十五种佛经。

经此次核查，目前馆藏比周目所记增加《大般若波罗密多经》二十一卷（18、21、22、26、27、34、71、93、94、95、96、97、103、104、112、113、281、283、293、294、355），《大方广佛华严经》三卷（61、62、71），《大悲经》一卷。另外，裱于他经经背的《菩萨地持经》、《大智度论》以及两页瓜州审判记录背面的《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数量虽小，但从西夏文佛经种类上着眼，也不容忽视，应列入目录之中。周目中有、目前馆藏中不复存在的佛经有《金光明最胜王经》四卷（4、7、9、10。其中除卷第七外，另三卷有复本），《金刚萨埵说频那夜迦天成就仪轨经》一卷，《佛母大孔雀明王经》一卷，《大方广佛华严经》五卷（37、45、67、75、78）<sup>③</sup>，整理时对每卷佛经的页数都做了查对。

这些佛经中，有的保存完好，页面连贯；有的折页处磨损残甚，各页互相脱节，甚至前后颠倒，次序紊乱。尤以几卷《慈悲道场忏法》和两卷《现在劫千佛名经》最为突出。因佛经中各页并未注明页码，要把散乱各页按前后顺序排好并非易事。必需把佛经逐页译成汉文，再对照汉文佛经，同时依据页面上可利用的特点，才能确定其先后顺序，重新整理成册。此工作已经完成。

这批佛经残本甚多。各卷中经文基本上保存完整的只有八十余卷，残缺经文占四分之一。周目中对残本已一一注明，至于残到什么程度，缺多少页面，只有一部分做了具体说明。这次我们对所有经卷中的残本，依据汉文佛经原文一一核对出所缺部分的起止字句，并估算出所残页数。如《慈悲道场忏法》卷三从“道路不同，会见无期”至“教化地狱”中间约残13页。又如《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十五从“佛子庆会无伦匹”至“况入法海具功德”中缺39页。

《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共有两册，因为第五卷的一册存前半，一册存后部，两相拼合，恰成完本（唯第二册多出佛像一

纸)。对此，周目已注意到，这次整理时，我们把它们归为一册。又一册中杂有《华严经》几卷的封面和首页以及《大般若经》的一些残页，我们也把它们分别归入各部。

## 二、翻译品名、题款、序言和发愿文

此次整理西夏文佛经时，凡周目中已译释的经名、品名和题款，我们都重新核对一过。周目中所缺的全部做了补译。周目和《考略》误抄、误译的也做了更正。如《考略》把《金光明最胜王经》卷首的署名译为“白上大夏国仁尊圣德珠□皇帝 奉诏重翻”，实应译为“奉白上大夏国仁尊圣德珠城皇帝重校”。原译“…皇帝奉诏”于理不合，把“校”译为“翻”则混淆了校经和译经的时代。其余诸经如《妙法莲华经》、《现在贤劫千佛名经》、《悲华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经律异相》卷首校者署名中的“校”字都误译成了“翻”字。又如《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卷末西夏文题款中有四字，译成汉文为“师李耳卜”，周目抄错三字，《考略》更正一字，仍错二字，译成“师李耳塞”，与汉文题款中的“师李耳卜”，不能对音。“施食者”将“施”字写错，“转身者”“转”字写错。《悲华经》祝赞中“皇太子寿长千秋”译成“皇太子寿命千秋”，《华严经》卷第四十卷卷末重要刻款《考略》译为“实了管作字人出力者释律严能惠共复信随喜者一切皆普普成佛道”，应译为“实勾管做选字出力者盛律美能慧共复愿一切随喜者皆共成佛道”。“选字出力者”即拣字工。不难看出这条重要题记为确定《华严经》属活字版本提供了有力证据。

周目中未录的一些题款有的也很有意义。如《慈悲道场忏法》卷一封底里面有墨写西夏文一行，译文为“有此本者只唵慧增”。“只唵”是党项族姓，可以证明此经曾为一党项人所有。又《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卷第355末尾也有墨书发愿题款一行九

字,译文为“发愿者唵合讹成西宝(画押)”,其中“唵合讹”亦为党项族姓。这些对研究党项佛教史及考订该经卷时代都有一定参考价值。

有些佛经带有较长的序言、发愿文,这引起我们特别的兴趣,因为它们不仅是确定西夏文佛经刻印年代的可靠资料,还往往是研究西夏佛教史的钥匙。已整理、翻译的序言和发愿文有:

1. 《金光明经忏悔灭罪记》(原译自汉文)
2. 《金光明最胜王经流传序》(蒙古时期作)
3. 《金光明最胜王经发愿文》(蒙古时期作)
4. 《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元代)<sup>④</sup>
5. 《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序》(元代)
6. 《慈悲道场忏罪法序》(一)
7. 《慈悲道场忏罪法序》(二)(译自汉文)

翻译上述西夏和元代的序言、发愿文时,因无相类的译文做参考,难度较大。然而,从西夏语言特别是语法研究的角度去看,这个翻译工作又是十分有意义的,它们不像西夏文佛经那样因拘泥于汉文佛经的字数,有时出现削足适履,不完全合于西夏语法的现象。这些文献是宋元时期西夏语文体的真实记录,这在整个西夏文文献中,也是不可多得的。

这批佛经中有的卷首存图画一幅,其中有佛说法图,本事图和译经图。图中有不少西夏文题款,大都为该图画的注解和说明,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前的《西夏译经图》,本文作者之一已进行过考证和研究,图中西夏文题款成了解释该译经图、研究西夏译经史的重要资料<sup>⑤</sup>。《慈悲道场忏法》的梁皇宝忏本事图中也有题款两则,为梁武帝郗后死后化蛇,复又生为天人故事图的文字说明。一为“郗氏为蛇身处”,一为“郗氏生天处”。王静如先生曾对此图和图中题款进行过考证<sup>⑥</sup>。

### 三、考订版本时代

评价一部文献的价值，以及如何利用它，不能不注意其版本特点。对西夏文佛经来说，这一点更为重要。因为它不仅涉及佛教经典目录学的内容，而且关系到西夏佛教史方面的重要问题。这次整理工作对各种西夏文佛经由何人何时译成、以何本为翻译底本、何时校经、何时刻印、各有什么特点，以及互相间有何异同等问题，凡有线索可查的都做了些考证工作。

一部分经卷前对译经、校经的时间有明确记录的，版本时代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只要把西夏文正确地译成汉文就可以了。如《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卷首有作者、译者、校者署名二行，其汉译文为：“尊者众贤作”、“汉本大唐三藏法师玄奘翻译”。《大方广佛华严经》用西夏文注明“唐于闐三藏实义难陀译”。又如《添品妙法莲华经》卷首有西夏文二行，译文为“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 汉译”、“奉当今 皇帝勅重校正”，卷首又有西夏文祝赞三条，译文为“当今皇帝御印”、“仪天兴圣慈仁昭懿寿元皇太后御印”、“正宫皇后御印”。按仪天兴圣慈仁昭懿寿元皇太后为元武宗、仁宗之母。可知此经重新校正时期为元代武宗或仁宗时（1308—1320），其刻印也当是此时。而由梵译汉本为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所译。再如《悲华经》卷首祝赞中记明“奉勅大德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印大藏经五十部流行”，后又载明译校者署名“天生全能、禄番祐圣、式法皇太后梁氏御译”，“就德主世、增福正氏、大明皇帝嵬名 御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嵬名御校”。我们已知署名译者的大明皇帝是西夏惠宗秉常，署名校者的皇帝为西夏仁宗仁孝<sup>⑦</sup>。由此不难知道此《悲华经》由汉译夏当为西夏惠宗时期，校经在仁宗时期，此本印制在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这些佛经中明确注出在西夏惠宗时期由汉文译

为西夏文的还有《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慈悲道场忏法》等。注明在西夏仁宗时校经的有《现在贤劫千佛名经》、《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大方广佛华严经》、《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等。此外《金光明最胜王经》首卷卷首载明“奉白上大夏国仁尊圣德珠城皇帝勅重校”，仁尊圣德皇帝亦为仁宗，知此经在仁孝时期曾重新校正。

有些佛经卷首虽无明确记载，但通过对其序言或发愿文的翻译和考证，也足以确定该经的版本时代。如《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卷末附西夏文长篇发愿文，文中记述有元一代世祖、成宗、武宗以及当时仁宗时期刻印西夏文佛经情况，并载以发愿时间为“大元国皇庆元年岁次中秋望日”。不难推断此《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即元皇庆元年（1312）所印。又如《金光明最胜王经》前有兰山石台云岩慈恩寺一行沙门慧觉所集《金光明最胜王经流传序》一篇，经末又有施主陈慧高发愿文一篇。通过翻译和考证，确定此经的重新刻印在西夏灭亡以后，改变了过去西夏文专家们认为是西夏时期刻印的说法<sup>④</sup>。并可知所据汉译本为唐净义所译，因两文较长，加之考证比较复杂，已在另文讨论<sup>⑤</sup>。

有的佛经刻印年代在佛经中找不出任何文字依据，又可从其所用纸张、刻印情况、页面大小、行款字数进行考订。近些年来，我们注意了馆内外所藏各种西夏文佛经，在明确记载刻印时期的经卷中逐渐由个别到一般地找了一些特点。一般说来，元代印经多为淡黄色细棉纸，每页多为六行，行十七字。可能由于当时懂西夏文的人已大大减少，翻阅不多，或者是专为供奉所用，因而经文页面较新且净。有文字题款可定为元代刻印的如《添品妙法妙华经》、《悲华经》、《阿毗达磨顺正理论》、《现在贤劫千佛名经》、《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都有上述特点。由此可以推知，一些文字上无从稽考，但从版本特点上与上述几种典型的元代刻经相同的刻经，如《不空羼索神变真言经》、

《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密多经》都可相应地定为元代印经。

如上所述，一些西夏文佛经已注明译文所据底本，但更多的佛经未能注出。在整理过程中，通过翻译西夏经文并与汉文佛经相对照，找出了一些佛经翻译所据底本。六百卷《大般若波罗密多经》为唐玄奘译自梵文，馆藏二十一卷西夏文佛经与玄奘所译汉本相合，可知此经自汉译夏是依据玄奘译本。用这个方法又对出《悲华经》系以北凉昙无讷译本为底本。《不空羼索神变真言经》以唐菩提流志为译本，《金光明最胜王经》以唐义净译本为底本。

#### 四、辨别真伪

西夏文文献的价值为世人所重后，有人乘机复制、伪造西夏文佛经，流传世上，以假乱真，鱼目混珠。此类贗品北京图书馆亦有收藏，作为辨别真伪的一种依据，另行收存。

贗品《大方广佛华严经》第四十一卷有十余册，其页面、行款、字数乃至字迹笔画一似元刊佛经。恰巧馆藏中有一部元刊活字本《华严经》卷第四十一，两相比较，方知前数册经乃据元刊活字本石印复制而得。其根据如下：

1. 两种版本中各页字、行虽完全一致，元刊活字本因文字透墨不同，页面背后各字深浅不一。石印复制本并无此特点。

2. 活字本系用淡黄色细绵纸，与多数元刊本所用纸张相同。石印复制本用白纸印刷，页面高出原经2—2.5cm，显系晚近所出。复制本纸张粗劣，册页两端烟茶色显系人为薰染而成。

3. 元刊活字本《华严经》印成后，即分发河西一带，自卷一至卷八十为一部。同一卷经集中若干册是极不正常的。石印《华严经》第四十一卷仅馆藏就有十余册，这也是证明其为伪造的一个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民族文化宫、北京市法源寺也都藏有这种石印复制本《华严经》第四十一卷各一部。

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馆藏西夏文手抄经卷一轴，长180cm，高26cm，精心裱衬。经后有许琴伯的购经记：“此西夏文经卷残本甲申初夏购于城西护国寺冷摊上，据售者称，系故家苗姓所藏，其先人在民初曾官于甘肃玉门县，盖得诸敦煌石室中。今观纸本墨色陈旧浑朴，自是数百年前古物，至足珍也。琴伯许以栗记于北京之小自在室”。后又有俞陛云识款，也认为是西夏遗物：

“西夏立国二百年，文治武功皆有可纪，祇以蕃史无汉文，遂宗社烟消，传世者惟载通碑与掌珠，赞佛而传播殊罕。琴伯烟台得此残卷，为偏霸秃发留此余踪，亦足珍矣。”又有王静如先生之河西字佛经评释三条：一、大方广佛华严经契卷七十四第（卷第七十四）首（音）；二、唐于闐三藏实义难陀译；三、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悖睦懿恭皇帝监（谨）颁（施）。琴伯先生宝藏，王静如试译。据三位先生所见，一为“数百年前古物”，一为“偏霸秃发留此余宝，亦足珍矣”，一为“宝藏”，似都认作真品。

然评审此残卷确为一纸贗品。观其纸本虽伪做陈旧，墨色却极类新写。特别是从西夏文字去分析，伪造痕迹尤为明显。卷中西夏文系一人所抄可分为两种字体，一为经文大字，一为译者、校者题名小字。大字笔画基本上还算正确，但小字题名错误十分显著，虽字数不多，错误比例却很大，这些错误足以表明抄写者是一个不熟悉西夏文的人自他经摹写的。因原经大字清晰可辨，伪造者照猫画虎，尚可接近原貌，故文字笔画还算正确。但原经小字笔画有粘连现象，加之字小，自然难以准确摹写。若是懂得西夏文的人，正确写出这些小字是轻而易举的事。小字题款出现这样多不应有的错误，说明写经者实在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了。这就露出了伪造的马脚。

## 五、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通过这次整理北图西夏文佛经，我们不仅可以对北图所藏佛经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就是对世界范围内西夏文佛经的认识，比如数量、种类、版本、范围都有极大的帮助。下面我们想谈几个问题。

### （一）西夏文佛经的种类、范围。

据文字记载，西夏文佛经共有三千六百余卷，这就包括了汉文佛经五千余卷的大部分。而保存到现在的西夏文佛经（包括写本和刊本）只能反映出西夏文大藏经的一部分。

保存在北图的一百余卷西夏文大藏经共有一十五种。依佛经内容分类为：

#### 经藏：

- 大般若波罗密多经（般若部）
- 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密多经（般若部）
- 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部）
- 悲华经（华严部）
- 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华严部）
- 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华严部）
- 大悲经（涅槃部）
- 金光明最胜王经（涅槃部）
- 妙法莲华经（涅槃部）

#### 论藏：

- 大智度论（释经部）
- 菩萨地持经（宗经部）
- 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宗经部）

#### 密藏：

- 佛母大孔雀明王经
- 不空羼索神变真言经

## 撰述：

慈悲道场忏法 （语录部）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语录部）

经律异相 （纂集部）

如果我们再结合苏联以及其它国家所藏西夏文经分析，可以看到，目前传世的西夏文经不仅数量多，且其种类也较齐全。经、律、论三藏都有译典，显密二教同时流行。汉藏中的撰述部分，也译成了西夏文。西夏人自己也有撰述。这在以前被人们忽视了，人们只谈西夏的译经、校经，没有注意当时的撰述。苏联所藏目录中有《番语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说》、《番语圣观自在千眼千手之供顺》等，是否为西夏人所撰虽尚难断定，而汉文大藏经内有《密呪圆因往生集》一卷，确是夏僧智广、慧真于西夏天庆七年（1220年）所撰。这是明显的西夏人的作品。西夏文佛典中还有相当部分译自藏文佛经。

## （二）西夏文佛经的标号

由于佛典的浩繁，为了检索查找方便。汉文大藏经于每一书函标一字号，以《千字文》为序。如《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六百卷，十卷一函，用《千字文》首六十个字，自“天”字至“奈”字。西夏文大藏经可能也效法了这一办法。王静如先生早就论及此事，这是很正确的<sup>⑩</sup>。然而，西夏文经标号，又不能以汉文《千字文》标号刻板相套。苏联聂历山教授曾寄给王静如先生《大般若经》的四十个标号，王先生仍以汉文《千字文》“天地玄黄”以下四十个标号比附，其字义多有不合<sup>⑪</sup>。这四十个标号，在北图所藏《大般若经》中，已有十个，校比后得知，原抄有误者至少三字。其标号意义为：“天长不散，空广最胜，地无神首，圣星聚集，霄地本源，鸟产卵蛋、感应已就，指几未全，□日星无，嘿味垢见”。从字义、语法上讲，也可组成四字一组的短语或句子，但绝不同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等。估计

以西夏文为佛经标号时，利用了自己编写的著作中的文字，代替了汉文《千字文》。利用西夏文佛经标号者，不可不查。

### （三）馆藏西夏文佛经的活字印本

馆藏西夏文佛经分写本，木雕板印本和活字印本三种。写本又分楷书《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和行草《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刻本较多，除上述写本和《大方广佛华严经》外全为刻本。但数量最多的还是活字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共有六十一卷。在世界所藏西夏文经的国家中，是首屈一指的。这对研究我国早期活字印刷提供了方便。

对此种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考订为活字版，首推罗福苕，他早在二十年代已做出了准确的结论。1958年后日本藤枝晃氏又罗列证据，进一步证明，1966年西田龙雄氏亦补充事例详加论述。1972年王静如先生又以宁夏所藏《华严经》再次论说。这次整理《华严经》，能于五十多卷中寻求特点，更有一些新的体会。

首先，可以发现各卷经文墨色深浅不一，不少常用字色浅，经背透墨自然也少，其原因十分明显。因当时活字排版，各字所备数量有限，各卷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字，开始尚可供排拣，后因用此等字过多，备字用尽，只好暂阙。经印成后，再以该字沾墨打印，其墨色自浅；有的甚至字形歪斜。如卷第十二的大、不、皆、之、无、顺、因等字，卷第三十二的梵、行、令等字，卷第三十四的迴、趣等字，均是此种情形。

最为重要的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华严经》卷四十最后一页题款中的“选字工”即为排字工匠。可证为活字排板无疑。又日本京都大学所藏西夏文《华严经》卷五末尾附题记一条，汉译为“发一全愿令雕碎字勾管印造者都罗慧性”，其中“碎”字当指活字，更证明这种《华严经》确为活字板。

### （四）馆藏西夏文佛经的来历

1932年所出《国立北平图书馆刊》四卷三号（西夏文专号）《启事》首记：“民国十八年秋，本馆购入宁夏发见之西夏文佛经百余册，皆属宋元旧刊，蔚然成为大观。”然于宁夏何时何地发现则语焉未详。

据《甘青宁史略正编》卷二十九载：民国六年“九月，宁夏灵武县发现西夏写经”，后注“……灵武县知事余鼎铭修城，于城墙内掘获西夏写经两大箱，毫无损坏，送往宁夏镇守使署。”这批佛经有一部分目前藏于甘肃省张思温先生处，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十一至卷十五卷，其函袱内有近人冯国瑞的记文：

“闻之临夏张思温兄尊人质生先生：安康人余鼎铭字介彝，民八知灵武县事，于近郊番寺旁农人耕地得明布政使王骥墓及五瓦坛，内藏夏文经甚多。时质生先生佐护军使马福祥幕。介彝获此坛藏，以多帙赠马，以此五册赠张，遂得保存至今。马所藏早已分散无考”。<sup>②</sup>两处所说当指一事，只是具体记载互有出入。不过我们可以从中找出以下线索：

1. 民国初年宁夏灵武出土了一批西夏文佛经。
2. 这批佛经由当时的知县余鼎铭处理。
3. 张思温先生所藏《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其中的一部分。

张氏所藏为《华严经》卷十一至卷十五。又日本现藏有得自中国的西夏文活字版《华严经》卷一至卷十以及卷三十六。宁夏罗雪樵先生也藏有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北图所藏活字板《大方广佛华严经》有两部，由两种稍有区别的纸印成。因此，有些卷有复本，如33、35、45、65、66、69、70、71、80等卷即是。张氏和日本所藏是经不仅北图皆无复本，而卷一至卷十、卷十三、卷三十六更是北图所缺。看来，宁夏灵武所出西夏文佛经被肢解成若干部分。一些分散于宁夏、甘肃私人手中，有的则流失海外，当然还有一部分可能遗失了。但是有一大批则由北京图书馆购入。目前北京图书馆的西夏文佛经中，除《大般若波罗密多

经》和《六祖坛经》外，可能都属此类。

注释：

- ①《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四卷3号（西夏文专号）第341—360页，《附馆藏西夏文经典目录考略》（以下简称《考略》）。
- ②当时参加整理工作的除本文作者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应琳同志。
- ③《国立北京图书馆由沪运回中文书籍金石拓本与图分类清册》中于“释家类”收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一册、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一册、西夏文经律异相一册，为1934年南迁、1943年运回京者，现已装楠木盒另行收藏。
- ④史金波：《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译证，载《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
- ⑤史金波：西夏译经图解，载《文献》1979年第一辑。
- ⑥《北平图书馆馆刊》四卷3号《引论》，文中王静如先生将两条题记译为“泽氏蛇身为处”，“郗氏天生从”。
- ⑦同⑤
- ⑧王静如：河西字藏经雕板考，载《西夏研究》第一辑。
- ⑨史金波：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载《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
- ⑩《西夏研究》第一辑《引论》第9—12页。
- ⑪《西夏研究》第一辑《河西字藏经雕板考》。
- ⑫张思温：活字版西夏文《华严经》卷十一至卷十五简介，载《文物》1979年第10期。